

■孔廟大成殿



■很多海外學校都設立了孔子學院



■孔子為復興國學之人膜拜的對象

「國學熱」探析

朱壽桐教授談國學復興

近年來，國學熱，是內地較為流行的一股文化思潮。從知識精英到普通民眾，都對國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與看法，不同文化觀點與立場的人也對國學的發展抱持不同的態度。那麼，該如何看待當前的國學思潮？其未來的發展有何走向和值得關注的動態？不久前，本報專訪了對傳統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請他談一談有關國學熱的問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資料圖片

一般觀點認為，國學思潮所引起的國學熱，是一種對傳統文化與精神的回歸。然而，朱壽桐教授認為，國學熱的產生，恰恰是在對西方文化進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出現的，如果沒有對西學的深刻體認，是難以發掘出國學文化中的精神資源的。

國學熱源自對西方思潮的深入解讀

朱教授認為，這裡所討論的國學熱，可追溯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時，隨着內地改革的深入，經濟市場化開始初現雛形。經濟的自由帶來了文化領域的多元與開放，社會生活領域也開始走向成熟和包容。這一社會發展趨勢，最終帶來了文化領域的變革。在八十年代，文化領域的開放，帶動並興起了社會科學熱。這一熱潮的最直接體現就是重新整理和翻譯了一大批西方文化與思想的經典代表作。這對後來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學術名著系列，以及不止一套的《走向世界》叢書之類，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伴隨着西方的社會思潮、哲學觀念以及美學流派的進入，當時的中國知識與文化界掀起了閱讀文化經典的高潮。

在西方文化湧入的過程中，中國的部分知識分子在文化上顯得無所適從。出現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當知識分子深入了解了西方的文化體系與觀念後，發現西方文化的某些價值核心——比方說人文主義觀念，與西方文化的工具模式——科學主義的方法論，同傳統的中國文化、學術以及精神理念是相同的。因而在飽餐了西方文化的食材後，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試圖打通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橋樑，即在西方的新人文主義思潮中，找到與中國傳統相對

應的理性精神。在朱教授看來，當代的理性精神，意味着對市場經濟與多元文化的認同，是文明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在中國文化中可以發掘到的素材，因而，具有高度的普世性。

國學熱並非全盤抵制外來文化

提起國學熱，就不能不提到新儒家思潮的發展。朱教授認為，新儒學在華語世界的興起，是在國學熱發展的過程中，華人世界在對外開放後形成的文化回顧，類似於胡適當年提出在倡導全盤西化後反過來強調的「整理國故」。但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與晚清時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不同，當下的新儒學具有鮮明的包容性與開放性，而並不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出現的文化自救反應，它並非要抵制某一種外來的文化，而是理性精神的自我省察，符合人的基本價值取向。從根本上說，當代的新儒學，以及背後代表的國學思潮，是一種與當代的開放世界相適應的文化理念，即用新儒學的視角去擁抱西方文化思想的精髓，從而實現文明的多元與共融。

隨着國學熱在中國內地甚至整個華人世界持續發酵，勢必出現不同的流派與思潮，這樣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朱教授認為，隨着國學熱的深入發展，將會產生三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分支，他們各自產生的影響將是不同的，因此要保持持續關注。

第一個分支，是持續走向文化開放與包容立場，適應現代化的潮流，主張將固有的華人文明融入世界，以取得文明共存的雙贏效果。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思潮較為注重對傳統文明中的一些工具作用的發掘，以此來修正現代主義氾濫後形成的各種非理性問



■朱壽桐教授認為，國學不可以工具化。 徐全 攝

■未成年入參加讀經



題——如環境的破壞、道德的淪喪或是精神信仰的缺失等等。

第二種發展趨勢，可能較多存在於部分文化知識精英中。這些知識分子具有濃厚的文化懷舊意識，以強烈的情感維護中國文化中固有的國粹，甚至逐漸走向復古的傾向。這是一種情感意義上的國學思潮，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抽離了理性精神。作為個人的價值觀與信仰，或許能夠得以保持，但是要形成一股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潮流，恐怕比較困難。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與晚清的國粹派有着很大的差別。晚清的國粹主義，至少在現實層面承認了中國文化中的一些缺陷以及面

臨外部的巨大挑戰，且他們對現實的中國文化環境也有着較為清醒的認識。但是當今以情感訴求為原動力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全球化與多元文明的背景下，倡導文化復古，以文化的新舊論好壞，有失偏頗，已經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此，他們未來的發展將會非常困難。

國學發展的第三個分支，是將國學推廣工具化，也稱之為「實用化的國粹思潮」。在不同的社會，都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為主導，為了實現自身的目的，會將自身的思想普遍化，就會將自我的價值解釋為傳統思想，以此來達到社會效果。例如，在民國時期的二三十年代，為了抵制左翼思潮的擴大，當時的部分右翼文人就將自己的思想工具化，解釋為傳統文化，以強化固有的倫理等級秩序。朱教授認為，從後來的效果來看，經過數千年的文化積澱，國學的精髓，其實更加適合於人的修身，適合於各個時代的價值理念，適合於精神操守的保持與發揚，這是一種價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如果將國學工具化，是不會有前途的。

港澳地區推廣國學的現實性

談及港澳地區的現實，朱教授認為，港澳地區已經是發達的現代社會，並不存在所謂的「返本開新」問題，因而無需在港澳地區去為古老的價值命題打通新的橋樑。相反，港澳地區的文化相對多元，社會實用的壓力最小，非政府組織發達，如果能夠在港澳地區系統、全面、徹底地推廣國學，應該是最有效果、也是最有前途的。事實上，許多儒學組織已經在這方面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

但是，以香港為例，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是，雖然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大批文人進入香港，並且在香港發動了影響巨大的儒學復興運動，但是國學與文化的傳承往往集中在少數精英層面。就廣大的一般的社會層面而言，由於殖民地的歷史背景，起導向作用的，仍舊是西方的價值觀，因而在香港推廣國學，條件較好，但是基礎較為薄弱，要形成系統化的國學熱潮，恐怕要下大力氣、花大工夫。

以國民教育推動國學發展

從朱壽桐教授的專訪中，我們可以得知，國學尤其是新儒學在香港的發展，曾經有過一個輝煌時期。但是，這種「輝煌」，基本上局限於少數南來文人的精英層面。對大多數香港民眾而言，國學、漢學或者是新儒學，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或者價值模式，並沒有太大的聯繫。因此，國學在香港的發展，實際情況其實並不樂觀。

這種現象的產生，其根本上，是由於港英殖民地當局的深度殖民造成的。這種深度殖民，影響極其深遠，它在根本上改變了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觀念。其中，殖民地當局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將個人利益與文化價值認同相掛鉤，從而實現

文化殖民的目的。例如，在官員委任方面，出於表面的對本港華人的尊重，殖民地政府確實將一些重要部門的關鍵職位交由華人擔任。但是，此類型的華人，實則已經是經過系統的殖民化教育和培訓的所謂「高級華人」——他們已經完全認同西方文化的價值理念與生活方式，因而被許多香港市民稱之為「香蕉人」，即黃皮白心。正是這種「高級華人」階層的存在，產生了群體性的示範效應，再加上港英政府為了抵制其餘意識形態思潮對本港年輕人的影響，不斷強化社會的娛樂化與商業化，使得青年一代人失去了深度思考與文明自省的能力。久而久之，部分人已經不是被動地遠離中國文化與思想，而是為

了個人的利益主動向中國文化說「不」，向西方文化靠攏。因此，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來自內地的文人知識階層稱香港為「文化沙漠」，也是有一定的現實背景的。

隱性港獨激化分離意識

回歸後，香港從一個殖民孤島，一躍成為中國璀璨的特別行政區。如果按常理判斷，在香港推動中國文化復興的教育，是言之有理、光明正大。但是，一百五十年殖民歷史造成的文化斷層，無法在短短的十五年之內解決。在香港的教育界，「香蕉人」群體仍然大量而廣泛地存在，他們在反對派的唆使下，頑固抗拒中國文化的推廣。部分香港人尤

其是青年人，對中國、中國文化的心理排斥，仍舊存在。有時，這種情緒，伴隨着突發事件甚至會有所增強。從整體上看，部分人基於對現實中國的否定，構成了對歷史中國、文化中國的叛離；反之，由於在心中拒不接納歷史、文化的中國，因而出現了對現實中國的疏離，甚至是「隱性港獨」的分離意識，如此構成了一種文化的惡性循環。

當前，社會正在激烈爭論有關國民教育的話題。目前的社會爭執，主要集中在部分教材的內容編纂上。筆者以為，在當前的背景下，爭論是否需要國民教育，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大家應當將討論的關注點轉移到如何辦好國民教育這一思路上來。國民教



■小童參加國學活動

■《論語》被視為儒家經典



■文：陳江